



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丛书

华言与蕃音

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

刘迎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丛书

华言与蕃音

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

刘迎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 /
刘迎胜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1
(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6823-9

I. ①华… II. ①刘… III. ①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国、
中东—中古—文集②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中
东—中古—文集 IV. ①H0-53②K24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2360 号

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丛书

华言与蕃音

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

刘迎胜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8 插页 3 字数 40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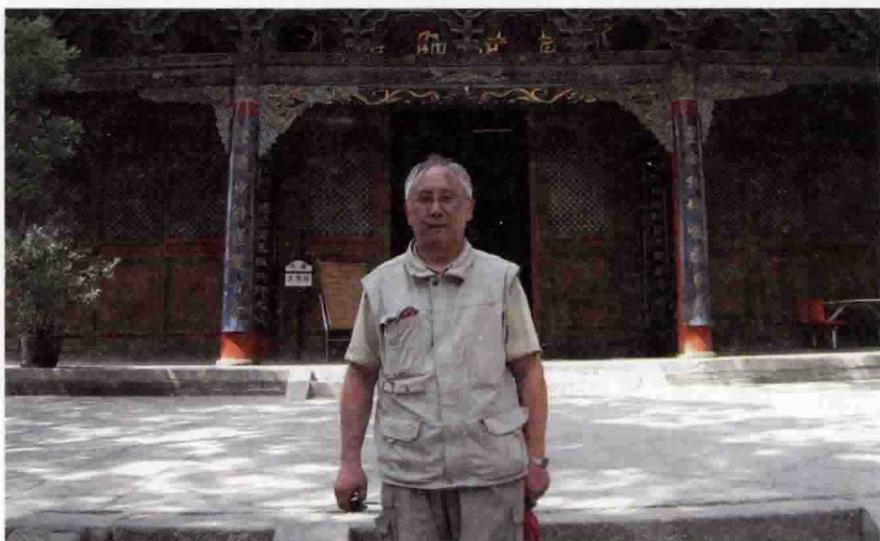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6823-9

K·1720 定价: 9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刘迎胜 男，河南省获嘉县人，1947年生于山东沂水。学历：1981年获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任职：1988年起为南京大学教授，1989年起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主任，1990年起为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社会兼职：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2004年起），并任中国蒙古学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学会副会长。2010年起为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兼职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外研究经历：三度作为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员，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和班贝格大学任外籍研究员与客籍教授，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与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从事研究。三次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与“游牧/阿勒泰丝绸之路”考察，曾任国际考察队副队长和队长。学术专长：蒙元史、中外关系史、内陆亚洲及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已发表学术论著100余篇（其中在境外以外文发表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7部。

目 录

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	1
唐元时代中国的伊朗语文与波斯语文教育	17
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	29
中国官办波斯语教学教材源流研究	40
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交往中的翻译和语言学习问题	54
《回回馆课集字诗》回回文研究	85
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年月的开启及终结	110
关于我国部分穆斯林民族中通行的“小经”文字的几个问题	129
“小经”文字产生的背景	
——关于“回族汉语”	145
回族语言 800 年发展史简要回顾	158
回族与其他一些西北穆斯林民族文字形成史初探	
——从回回字到“小经”文字	174
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	193
社会底层的汉—伊斯兰文明对话	
——对回族语言演进史的简要回顾	228
有关《简明小儿锦—汉文—波斯/阿拉伯文辞源研究词典》的 编纂问题	243
中古亚洲大陆民族双语字典编纂传统	
——从《双语辞典学导论》谈起	289
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亚民族交往的三座语言桥梁	
——《华夷译语》与《国王字典》的会聚点	325
十三—十六世纪中国与东亚以外地区交往的外交语言问题	353

2 华言与蕃音

《米诺哈志》的作者及其波斯文动词分类原则初探	377
《回回药方》与中国穆斯林医药学	409
寻访东干人	431

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

一、墓志研究概况

1955年冬,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西安市土门村附近发现唐苏谅妻马氏墓志。志石正面上半刻有某种外国文字,横书六行;下半为汉文,直书七行。该志石现展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于《考古》1964年第9期,在报告后面附有夏鼐先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跋》。夏文对墓志汉文铭文作了详尽的考释。墓志的外国文字部分,由日本樋口隆康教授委托当时京都大学伊藤义教博士研究。^①伊藤博士确定志石的外国文字部分为中古波斯语之巴列维文(Pahlavī)。他借助汉文合璧铭文解读了该巴列维文铭文。其解读工作包括将巴列维文铭文摹写复原、拉丁字注明中古波斯文读法,并加注释。伊藤博士在解读和论文写作过程中,同夏鼐先生保持密切的通讯联系。夏鼐先生的意见在伊藤博士的论文中时有反映。同年他还将其释文以法文撰写,另文发表,题为《西安出土汉合璧墓志番文解读记》。^②

现存于世的巴列维文刻石不过二十余件,绝大多数在伊朗,少数存于西方大博物馆。因此,西安发现的这一方汉—巴列维文墓志,通过伊藤氏

① [日本]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波、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② Gikyo ITO, *Explication du Texte Pehlevi de l'Inscription Tombale Bilingue en Chinois et Pehlevi Déterrée à Sian*,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Western and Southern Asiatic Studies*, No. 13, December, 1964, Kyoto University, 页 17—34。

研究成果的发表,迅速吸引了海内外“伊朗学”界专家的注意力。伊朗设拉子巴列维大学博士讲师葛莉白女士,1966年著文《中国发现的巴列维文墓志》,刊于《德黑兰人文学院杂志》,^①评论伊藤的研究工作并向伊朗国内学界介绍本世纪初普鲁士考察队在我国新疆,发现并掠走大批中古伊朗语文献残件之后的这一新发现。同年,原民主德国科学院的中古伊朗语言学家松德曼博士和汉学家蒂洛博士合作,在《东方研究所学刊》上刊出论文《论西安中古波斯—汉合璧墓志》。^②这两位民主德国学者的论文,是伊藤氏之后,海外研究西安汉—巴列维文墓志的另一篇有分量的研究报告。两位作者充分显示了汉学与伊朗学相结合的特色,从多方面对夏鼐和伊藤氏的观点进行讨论。进入70年代,又有中外学者陆续以此墓志为题,进一步探讨中古时代中国与波斯的人员、经济和文化往来。1971年布达佩斯出版的《古典时代研究学报》发表哈尔玛塔的论文《中国—伊朗》,同时他在罗马出版的《有关中古波斯专题国际会议论集》中,还发表了题为《西安中古波斯文及汉文合璧碑及中国—萨珊王朝关系》。在上述匈牙利杂志中,刊出的还有埃克塞提的论文《西安出土的公元874年的中古波斯文—汉文墓志》。^③此后不久,伊朗著名学者罕拉里出版了他的专著《波斯语言史》(*Tārikh-i Zabān-i Fārsī*),将西安碑铭作为最新考古发现,收入下册第二章内。^④1977年10月,夏鼐先生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的第六届伊朗考古年会上,宣读了论文《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其中第四节专门以考古新发现为题,介绍马氏墓志。^⑤

由于巴列维文刻石存世无多,所以几乎每一方刻石的新发现,都会在

① Badr al-Zamān Charīb, *Katiba-i bi khatt-i pahlavī dar ĕn, Majalla-i Dāniškada-i Adabiyāt-i Tihirān*, no. 53 (1345/1966), vol. 14, no. 1, 页 70—76。

② Werner Sundermann und Thomas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 Band XI, Heft 3, 页 437—450。

③ 见《考古》,1978年第2期,页116注(14);及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s,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sul tema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e, 1971。

④ 见英译本 Prof. Parviz Natel Khanlari,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Language*, tr. by Dr. N. H. Ansari, New Delhi, 1979, vol. 2, 页 52—53。

⑤ 论文刊于《考古》1978年,第2期,页111—116。

研究者中引起轰动,更不用说这种发现发生在距伊朗万里之外的中国了。中古波斯语语言学者日纽,在1972年出版的《巴列维文及番兜文铭文辞典》中,已将《马氏墓志》的巴列维文铭文命名为SN铭文(西安二字汉语拼音的缩写),并将铭文中已确切认读的词汇收入。^①

二、关于巴列维文

我们这里所说的巴列维文,是指以一种阿拉美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文。巴列维(Pahlavi)这个词,是见于古波斯楔形铭文的一个名词 parthava 的中古形式,即古代安息王国的中心地带,我国现代的世界史教科书均译称为“帕提亚”,而古籍《汉书》则名之为“番兜”,^②在今伊朗与阿富汗、前苏联交界地区。所以,巴列维语原指伊朗东部方言,但这个的原始意义与后来的使用范畴并不相同。

在现代伊朗国内学术界,“巴列维文”通常泛指以各种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语书面语,而在西方伊朗学界,“巴列维文”则通常专指那种以阿拉美字母书写的中古波斯语祆教和非祆教文献书面语。本文也在这层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这种文字所表达的中古波斯语,从语法上来说,已很接近新波斯语。古代波斯文化受到古代西亚文明的强烈影响,巴列维文不但字母直接源于西亚的阿拉美字(Aramaic Scripts),而且还从阿拉美文输入了大量作为表音符号使用、依阿拉美文原文照书的闪米特语(Semitic,与阿拉伯—希伯来语相近的一种古代西亚语言)词汇。这些原文照抄的表意字,意义保持原闪米特语词义不变,而读法则按波斯语的相应词发音,与今天日语中汉字训读的情况很相似。

《马氏墓志》巴列维文志文以草体(伊藤义教论文的汉译者直接沿用日文名词“走行体”)刻成。本文拟在评述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略陈己见。

^① Phillippe Gignoux, *Glossaire des Inscriptions Pehlevies et Parthes*, London, 1972.

^② 《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条。

三、汉文志文与巴列维文志文

汉文志文部分保存相对较好,基本可以认读。据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报导,汉文志文共为7行,41字,其文如下(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数):

1. 左神策军散兵
2. 马使苏谅妻马
3. 氏己巳生年廿六
4. 于咸通十五年甲
5. 年[岁]二月辛卯建
6. 廿八日丁巳申时身
7. 亡故记。

重查铭文字数,发现汉文志文四十一字之说不确。夏鼐的附录最后补记“这跋语写毕后承陈梦家先生襄助,借放大镜之力,再细察拓本,‘二月’的前面空格中确隐约有一‘岁’字书。故书此以加补正”。这样,加上最后由陈梦家、夏鼐两先生辨认出的第五行第二个字“岁”,共计应为44字。

志文的巴列维文部分与汉文部分相较,篇幅较长,但保存度较差。《考古学报》所刊伊藤氏论文的译文中,巴列维文志文的拉丁转写包含若干错误。现将我重新认读并参照国外学者研究校正的拉丁字转写录出;与伊藤氏论文译文有不同处,在释文中说明。拉丁字转写的下面,按学术界惯例注上拟测的中古波斯语读音。为方便读者理解志文,中古波斯语注音下面再逐字注上汉文释义。志文如下(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数):

- | | | | | | | | |
|--------|---------|----------|-----------|---------|--------|---|-----------|
| 1. ZNH | w'spuhr | 'nwšrb'n | m'syš | y | BRTH | y | 'nwšrb'n |
| | ēn | vāspuhr | anōšarvān | Māsīš-i | duxt-i | | anōšarvān |
| | 此 | 王族 | 逝者 | 马昔师 | 女儿 | | 逝者 |
| | | | | (人名) | | | |

2. prtwmspa' y syčn'sy y MN swryn ŠNT CC W
 fratomasp-i Sizinsai i hāč Sūrēn 'sāl 200 ut
 骑兵之长 左神策 出自 苏谅 年 二百 及
 XL y 'nwšrb'n
 40 i anōšarvān
 四十 已逝的

3. yzdkrt W ŠNT CCLX y tnyk'n ŠNT XV y
 Yazdkart ut 'sāl 260 i Tanikān 'sāl 15 i
 神所作 及 年 二百六十 唐朝的 年 十五
 (伊嗣俟)
 (人名)

hmy pyrwekr
 hamē pērōžkar
 总是 获胜的

4. hwt'y bwrč'wnd hm twn W BYRT spndrmt W YWM
 xwatāy varčāvand Ham-ton ut 'māh Spandarmat ut 'rōč
 君王 崇高的 咸通 及 月 十二月 及 日
 (伊朗历)

spndrmt
 Spandarmat
 五日

5. pwmy'n BYRH pt' 26 wtyr'n YHWWNC 'Ps g's
 pnm-ēn 'māh pat 26 vitīrān 'būt 'ut-aš gāh
 建卯之 月 于 二十六 死亡了 是 并她的 地点
 (过去时)

LWTH 'whrmzd
 'apāk Ohrmazd
 同 阿胡拉·马兹达

6. W 'māsrsp(nd'n) (BYN) grwtm'n y p'hlwm 'hw'n
 ut Amāsrasp(andān) ('andar) garōdmān i pahlom axvān
 及 天使们 在…里 天堂 极美好的 世界

YHWWN ... ŠLM
 'abavāt 'drot
 应是 平安

志文译文

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āsīš),于已故伊嗣俟(Yazdkart)二百四十年,及唐朝之二百六十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辞世。[愿]其住地与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极美好的天堂里。祝福。

四、释巴列维文志文

以下逐行依词汇出现先后顺序释之。

第一行

ZNH w'spuhr 'nwšrwb'n m'syš y BRTH y 'nwšrwb'n
 ēn vāspuhr anōšarvān Māsīš-i duxt-i anōšarvān
 此 王族 逝者 马昔师 女儿 逝者

ZNH,这个大写字母表示的词是表意文字,代表的是闪语近指指示代词“这”,按波斯语对应词发音读作 ēn。

vāspuhr, 王子, 王室后代。vās = vīs, 巴列维文, 译言王室后代; puhr 乃安息语(番兜语), 译言“儿子”。巴列维文表示“儿子”是 pus 或 pusl。

松德曼博士对 vāspuhr (w'spuhr) 这一读法表示怀疑, 他认为这个词的后一部分不能读作 vhr, 而至多只能读作 vry, 也即 vāspūr i, 译言“…的 vāspūr (王子)”。从字面上说, vāspuhr 或 vāspūr 义为“王子、王室之子”, 而“公主、王室之女”, 从中古波斯语吐鲁番文献中我们得知应是 visduxt。vis, 王室后代, duxt, 女儿。在安息文铭文中的闪语表义文字 BRBYT* (读作 vispuhr, 义为亲王、王子) 和 BRBTH (visduxt) 之间使用上的差别, 以及中古波斯文(巴列维文)沙卜尔一世国王 Ka'ba-祜教铭文颂语中的闪语表义文字 BRBYT* (同样读作 vispuhr, 义为亲王、王子), 和中古波斯语本族词汇 dvxšy (义为公主) 用法上的差别, 可视为怀疑这里 vāspuhr 读法正确性的依据之一。

松德曼曾就此碑文向容克教授(Junker)请教。容克认为, vāspuhr 似应读作 vāspuhrakān, 译言“王侯的”。在字 p(w)l (即-pūr, “儿子”, 巴列维文 l, r 不分) 后, 可辨读出三个字符: 第一、第二个两字符合成一个“缺首的”k。第三个字符可较清楚地认出, 是一个 -ān。所以第一个句子的开头几个字应读为: “这是高贵的(王侯家族的)已成为不朽的……”^① 由于这个字的确切认读问题尚未有定论, 本文暂采用伊藤氏的读法。

在伊藤氏论文汉文译文的拉丁字转写中, vāspuhr 后多出一个 i (“耶扎菲”(Izāfat), 约相当于英文的 of), 查拓本无此字。

anōšarvān, “已故的”。有些字典注音为 anōšarūvān。^② anōš, 文学语“永存的”, 指来生。ruvān, “灵魂”。

至于逝者马氏的巴列维文名字, 伊藤氏虽复原为 Māsīš (笔者译音“马昔师”), 但觉无把握。松德曼认为 Māsīš 这个名字在伊朗语材料中找不到例证。伊藤氏和夏鼎倾向于认为, 汉文志文第三行马氏之后的两个字“己

① Werner Sundermann und Thomas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en*, Band XI, Heft 3, 页 445—446。

② D. 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New York, 1971, 页 1。

已”，不是干支，而是马氏的名字，读作“马氏己巳”。松德曼和梯洛不同意这一解释^①，笔者亦以为不可取。“己巳”无疑表示天干地支，此处不是人名。

BRTH, 巴列维文中的闪语表义字，读作 *dux*t, 译言女儿。^② “马昔师” (*Māsīš*) 和 *dux*t (女儿) 两个字后的 *i* 都是中古波斯语的“耶扎菲” (*Izāfat*) 结构，表明后面的成份是前面成分的修饰语，略相当于英文中的 *of*。

第二行

<i>prt</i> wmspa'	<i>y</i>	<i>syčn'sy</i>	<i>y</i>	<i>MN</i>	<i>swryn</i>	<i>ŠNT</i>	<i>CC</i>	<i>W</i>	<i>XL</i>	<i>y</i>
<i>fratomasp-i</i>		<i>Sizinsai</i>	<i>i</i>	<i>hāč</i>	<i>Sūrēn</i>	<i>'sāl</i>	<i>200</i>	<i>ut</i>	<i>40</i>	<i>i</i>
骑兵之长		左神策		出自	苏谅	年	二百	及	四十	

'nwšrb'n

anōšarvān

已逝的

fratomasp (伊藤氏论文汉译转写中, 第一个字母 *p* 大写, 误。按惯例, 只有闪语表意字才大写), “骑兵之长”。对应的汉文志文是“散兵马使”。*fratom*, 首先, 第一, 最初。 *asp*, 马匹, 骑兵。

sizinsai, 伊藤氏在志文的译文中, 把这个词看作汉文“神策军”的音译, 而他解释巴列维文志文时又说, *sizinsai* 是“左神策军”的译音。^③ 松德曼和梯洛认为, *sizinsai* 是“左神策”^④的音译, 笔者从之。

MN, 闪语表意字, 读作 *hāč*, 译言“从…中, 出自…”。

sūrēn, 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在拓片上实际看不清, 显然是先假定“苏谅”是这个名字的译音, 再根据汉文“苏谅”两字拟测复原为 *s*-的。 *Sūrēn* 的

① 伊藤论文汉译, 页 199—200 及松德曼和梯洛论文, 页 446。

② 即今德语表示“女儿”的 *Tochter*, 英语 *daughter*, 俄语 *доч* 的同源词。

③ 《考古学报》, 1964 年, 第 2 期, 页 196—197 页。

④ 见二氏论文, 页 446 及第 4 页。

确是安息、萨珊二朝一个显赫家族的名字,是萨珊王族所出氏族,见于伊朗沙卜尔一世国王 Ka'ba 祆教铭文第二九和三一行:苏谅之萨珊(Sāsān i Sūrēn),苏谅之阿尔戴细尔(Artašer -i Sūrēn);以及 Narseh 在 Kaikuli 的巴列维文铭文之十六行;也出于沙卜尔一世国王祆教番兜文(安息文)第二三、二五行;以及 Narseh 在 Kaikuli 番兜文铭文之十五行。

这里 hāč Sūrēn“出自苏谅家族”,与志文开头处“王族之子”是相应的。

死者与“左神策军散兵马使”的亲属关系,是马氏墓志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汉文志文称她“左神策散兵马使苏谅妻”,巴列维文志文说她是“出自 S(?)ūrēn(苏谅?)家族的已故左神策(sizinsay)军骑兵之首领的女儿”。伊藤采取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方法,来解释两种文字志文之的差异:即汉文志文中这位左神策军散兵马使的名字“苏谅”乃是他所出氏族,伊朗的萨珊王族 Sūrēn 这个名称的音译。由于汉文志文中的“苏谅”,与巴列维文志文中经过校正的名字(s)ūrēn 是一个字,所以两种文字志文所反映出来的死者马氏,“与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的两种自相矛盾的亲属关系只能解释为:苏谅娶己女为妻!伊藤还以波斯祆教徒中通行的一种被称为 Xvetōdas 的血亲婚姻,作为证据。^①

松德曼和梯洛却另辟蹊径,他们不对死者马氏是女儿还是妻子这两种身份进行选择,认为除了考虑女儿经过血亲婚娶成为妻子的可能性以外,还可以这样设想:汉文志文和巴列维文志文根本不是为同一人所作。汉文志文为苏谅妻马氏而作,而巴列维文志文则为苏谅的女儿 Māsīš 而作,即两种志文分别记录的是母女二人。从原志石质地普通,制作粗陋判断,公元 874 年时,这位波斯王族移民的家境已经败落,似不能排除利用同一石材,先后两次刻上母女二人墓志的可能性。况且两种文字的志文所言死者逝年并不一致。笔者对此质疑:苏谅家族入唐已久,不会不知道中国的葬俗,母女二人合一块志石是有背于中国墓葬制度的。此外,汉文志文言明死者马氏享年二十六岁,巴列维文志文也勉强可以读出 26 这个数字,两种文字

① Xvetōdas,原意为“把铺盖朝自己拉近”,专指血亲通婚。伊藤论文汉译将此词最后一个音节误读作-dās。

志文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性,又迫使笔者不得不否定这二位民主德国学者的
大胆假设。

ŠNT,闪语表意字,读作 *sāl*,译言“年”。

第三行

yzdkrt W ŠNT CCLX y tnyk'n ŠNT XV y

Yazdkart ut 'sāl 260 i Tanikān ' sāl 15 i

神所作 及 年 二百六十 唐朝的 年 十五

hmy pyrwčkr

hamē pērōžkar

总是 获胜的

yazdkart 这个字在拓本照片上已不可认读,是伊藤氏拟构的。yazd,神;
kart,已做的。yazdkart,译言“神所作的”。《新唐书》中所记萨珊波斯末代
君王“伊嗣俟”(《旧唐书》作“伊嗣侯”)的波斯文名字,就是这个字。

Māsīš 的逝年伊嗣俟(yazdkart)二百四十年,可以 Mānuš čihr 书简推断,
相当于公历 872 年 3 月 17 日。与汉文墓志所记咸通十五年二月廿八日丁
巳(公元 874 年 3 月 19 日)相差约两年。^① 这一问题尚未有合理的解释,见
第二行释文。

此行第二字 W,为闪语表意字,读作 *ut*,译言“和、并且”。伊藤氏论文
汉译转写中,W 误为小写。

tanikān 这个词在拓片上看不清,是伊藤氏拟测出来的,解释为“唐朝
的”。但 *sāl 260 i tanikān*(唐朝之 260 年),这种纪年法本身就很奇怪。若
以唐高祖李渊登位称帝之年,为唐朝元年,则“唐朝之 260 年”应为 878 年,
与咸通十五年(874)相去四年。为解释这个矛盾,夏鼐曾向伊藤建议,由于
伊斯兰太阴历 260 年,恰好是咸通十五年。或许“唐朝之 260 年”,指的是
回历年。他猜测,也许是因为当时波斯王室已改宗伊斯兰教的缘故,造成

^① 《考古学报》,1964 年,第 2 期,页 198;松德曼、梯洛论文,页 447。

祆教徒除祆历之外,还用回历。^① 这样就要考虑 *tanikān* 读作 *tāčikān* (“大食的”)的问题。查拓本照片,铭文此处字迹不清,似乎可以读为 *tāčikān*。松德曼、梯洛亦有此意。^② 但夏鼐的这一假设于史无徵,所以本文仍转写此字为 *tanikān*,并释为“唐朝的”。

本行最后两个词 *hamē*,译言“总是”、“始终”。*pērōžkar*,“获胜的”。*pērōž*,“胜利”。唐代逃入我国的波斯王子名“卑路斯”,其波斯原名可能就是这个字。*kar*,“做”。元代摩洛哥旅行家的《伊本·拔图塔游记》中提到,他到元大都(今北京)时,大汗正出征在哈刺和林(*Qaraqurum*)与别里八里(*Bešbalıy*)二地抗命作乱的从弟 *Firuz*,最后大汗兵败被杀。按亨利·玉尔的意见,这里大汗指元顺帝(笔者按,亦有可能指天顺帝)。拔图塔并未至北京,他的描述显然是杜撰的。^③ 然而这里提到的大汗从弟之名 *Firuz*,却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就是中古波斯语的 *pērōž*,波斯人的确常常给君王或王族加上这个称号。

第四行

hwt'y	bwrč'wnd	hm twn	W	BYRT	spndrmt	W	YWM
xwatāy	varčāvand	Ham-ton	ut	'māh	Spandarmat	ut	'rōč
君王	崇高的	咸通	及	月	十二月	及	日

spndrmt

Spandarmat

五日

xwatāy,君王。波斯伊斯兰化之后,此词专指伊斯兰教之真主,今音译“胡大”。

Ham-ton,这个字在碑文中已无法认读。伊藤氏根据汉文志文,比定为

① 见伊藤氏论文汉译,页198—199。

② 见二氏论文,页447。

③ 参见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98,101注[二]。